

# “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志愿军文工团中有个杂技队，成员全部来自吴桥。不同于赴朝慰问的其他演出队，他们是部队编制，战斗一线是他们的演出阵地。作为志愿军战士们的调节剂和开心果，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 志愿军有支杂技队 队员全部来自吴桥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我收集了几张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文工团杂技队队员们表演杂技的照片。这些杂技队队员全部来自吴桥，拍摄者也是吴桥人！”昨天，吴桥学者、吴桥杂技文化研究者杨双印告诉记者。

照片中，杂技队员们正在为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表演车技、顶碟儿、高空杂技。要知道，这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轻松诙谐的杂技，与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士兵，看似不可能同框的事物，在这些照片中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穿过70年时光重看这些老照片，更加耐人寻味，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中朝人民热爱和平、追求美好的精神世界。



杂技队为志愿军表演车技

杨双印介绍，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文工团杂技队，前身就是张金发、张金波兄弟俩的铁金刚艺术团。

张金发在中国杂技史上是值得大书的一个。他是地地道道的吴桥人，生逢乱世，从小学杂技，1925年随兄去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演出，1937年回到国内。1947年，他组织“南洋铁金刚艺术团”，活跃于西南诸省。

解放战争期间，张金发的杂技团是国民党部队的宣传队。解放成都时，这支部队起义，他们的杂技团也跟着起义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参加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作为志愿军杂技队，他们跟随大部队来到朝鲜。

当时杂技队共有14人，有男有女，还有几个孩子。他们每天不是在演出现场，就是在马不停蹄地奔赴另一个阵地的路上。杂技队里小队员多，他们经常累得在舞台上扶着桌子就睡着了。但大家特别愿意为志愿军演出，很多时候，战士们是在看完节目、振奋精神之后，扛起枪去冲锋陷阵的。

杨双印提供的照片中，那张在山坡前表演车技的照片，就生动地体现了战争与杂技之间微妙的关系。杂技的表演舞台，就是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斗阵地。山坡上高高低低坐满志愿军战士，此时，他们从残酷的战斗中短暂抽离出来，放松身心观看表演。四个杂技小演员也忘了身在战场，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表演中。

照片的拍摄者张星，是张金发的儿子，当时，他也是志愿军杂技队的一名小队员。他说，杂技队演出都是选在傍晚时分。这个时候，夕阳正强烈，敌机从南面飞来，看不清下面的情况，正适合演出。夕阳快落山的时候，演出也就必须结束了。

杂技队里年龄最小的志愿军文艺兵是张玉生，入朝时，他只有九岁半。

张玉生是和几个哥哥一起参加志愿军杂技队的。他也是吴桥人，出身杂技世家，到他这已是第四代。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他们一家都是部队的文艺兵。围绕让谁上前线的问题，张玉生的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父亲坚持让儿子们都去，母亲肯求留下一个。父亲说：“都去！这是保家卫国的大事！”

穿上志愿军军装，拍完照片后，班长告诉他：“照片贴身保存，死了就是遗像了，好辨认，也给人留个念想；要是命大还活着，就自己做纪念吧！”至今，张玉生都随身珍藏着这张照片。

当时，去朝鲜慰问演出的社会各团体的演员们到的是二线，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他们是文艺兵，部队编制，必须去一线。难忘的场面太多了：过鸭绿江时，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走的是江下的“水中桥”；在一次行军中，为了保护张玉生，志愿军的驾驶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至今，张玉生都记得志愿军的一条铁的纪律：“宁可牺牲一个男同志，不能牺牲一个女同志；宁可牺牲一个女同志，不能牺牲一个小同志。”他说，自己这条命，是很多志愿军战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一想起他们，练杂技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张星离开朝鲜前拍摄照片铭记牺牲的战友们

## 记录是为了永远的怀念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180师在撤退过程中被美军截断包围后，遭受重大损失，很多志愿军战士被俘。当时，杂技队也被美军截断了道路。他们一路上翻山越岭，逃过美军的哨所和搜捕，一个不少地回到志愿军驻地，堪称奇迹。

有一次，上级派他们去俘虏营演出。演出结束后，几个高个子大胡子的外国人冲到张玉生面前，抱住他就是一顿亲。通过翻译他知道，这些“大胡子”也有孩子，和他差不多大。他当时情不自禁，用童稚的声音回敬他们：“你们也有孩子，为什么还要来侵略？”“大胡子”们一呆，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都高声说：“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

张星有一架120相机，表演杂技之外，他酷爱摄影，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场面。

离开朝鲜前，张星非常留恋这片异国的土地。在这里，不少与他同来的志愿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这里。临走前，他再次来到烈士陵园，与牺牲的战士们作最后的告别。之后，他爬上陵园后面的山坡，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志愿军总部与烈士陵园东西相临，周围群山环绕，烈士纪念碑与烈士墓园依稀可辨。张星说，拍照时，他心情非常激动，稳定了很久，才平复了情绪，拍下了这张照片。“拍照时就想把这一切都摄入镜头，留个纪念。”他说。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胜利归来，毛主席曾接见志愿军代表，其中就有杂技队的成员。后来，杂技队留驻沈阳，组建沈阳前进杂技团。几年后，他们再次到朝鲜演出，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幕再次被张星记录在光影中。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杂技队中，除了张金发外，王喜临也是留名中国杂技史的人物。他也是吴桥人，军级文职干部，后来是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和辽宁省杂技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奖。

最小的那名志愿军文艺兵张玉生，被分到战友文工团杂技团。他的“晃板”节目越练越好，后来成为国家最高级别演出的必选节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

# 从国立一中走出的校友们

本报记者 杨金丽

近日，全国各大媒体报道了92岁的“黄瓜王”、工程院院士侯锋去世的消息。

“侯锋是国立一中毕业的‘学生’！”一直致力于国立一中研究的沧州市第八中学教师李永翔说，“在国立一中，又何必侯院士！这所学校培养出很多人才，在各个领域都为祖国、为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期国立一中报道，让我们把目光放到国立一中的学子身上，看看这所主要由沧州师生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校，究竟培养了哪些人才。

## “黄瓜王”在国立一中读书8年

侯锋的贡献，体现在每个中国人的餐桌上。上世纪60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黄瓜抗病育种研究，其科研成果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黄瓜生产的落后局面，使黄瓜从“细菜”发展到今天老百姓一年四季都吃得起的“大路菜”。也因此，他被农民兄弟亲切地称为“黄瓜王”。

“侯锋1942年考入国立一中，1948年高32班毕业。当时正值国立一中最艰难的时期。侯锋毕业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和同学们留下来守护学校。1949年12月城固解放，国立一中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城固二中。这时侯锋才离开学校。1950年，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任研究员，从此走上了农业科学研究之路。”李永翔说。

他还拿出国立一中校友相关书籍介绍，2000年5月，在天津的国立一中校友们曾举办过一个聚会，主要内容就是祝贺侯锋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沧州是国立一中的发源地，杨玉如、刘钟智等是国立中学的倡导者、创建者、继承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之际，沧州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挺起不屈的脊梁，舍生忘死、历经艰难，保护学校资产，带领师生们转移办学的故事，令人感动。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他们坚持办学11年，培养了4000多名优秀人才。

## 一所学校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才

残酷的战争环境锻炼了师生们的体魄，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培育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做人之道。通过寻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老师们那种专心教学、倾力报国、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学生们那种刻苦奋进、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求学精神。

有校友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每年高校招生考试，在后方各大城市，都会看到一些衣着破旧、土里土气的考生。他们就来自国立一中。发榜时，人们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国立一中”的考生，几乎都能考出好成绩，进入高等学校深造学习。甚至有的学生高三还没读完，就考上了大学，还有部分毕业生，直接被保送进入重点大学。

侯锋只是众多优秀校友中的一个缩影。国立一中培养出不少像他这样的栋梁之才。

高中9班校友师昌绪，毕业后被保送到西北联大（现西北工业大学）工学院冶金专业学习，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金属材料专家、中国第一代两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高温金属材料之父。2011年，他获得全国最高科学技术奖，2013年被选为感动中国人物。

高中24班校友袁全珍，被保送到西北大学教育学院。大学毕业后，她参军来到新疆建设兵团八一中学任教，是全国优秀教师。她与开国将军甘祖昌结婚后，1955年随丈夫回到江西老家，当了一名山村教师，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奉献在最艰苦地方的教育一线。2012年，她被评选为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被选为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她与丈夫甘祖昌一起被选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建设者，多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被习近平亲切地称为“老阿姨”。

高中14班校友邢金钟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北京清华大学。1949年大学毕业后，先后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中国林业科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国立一中培养出许多名师巨匠，造就出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才。仅沧州就有岳炳忠、袁宗奎、李树鑫、苗俊岷等，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为名校校长，或在各自领域为新中国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还有一部分学生投笔从戎，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校友中，大学教授、名校校长、中医国手等不胜枚举，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

## 一种学风 延续教育文脉传承精神

翻阅史料，李永翔说，国立一中虽然创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但催生了青少年追求进步、民主的优秀学风。沧州师生转移创办“国立一中”所取得的业绩，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多年来致力于国立一中历史的寻访工作，李永翔保存着国立一中的校歌：“我校建立在抗日的前线，保育着新青年，犹如烘炉既熔且炼，五育锤成进发万丈光焰。同学们莫迟延，为了祖国的胜利，为了正义的伸展，同心同德，努力向前！要发挥母校精神，收复河山，任重道远，努力向前！”战火，没有熄灭文化的火种，反而淬炼出更加强大的民族精神与教育传承。国立一中倡导的“精神培养、思想善导、气节磨砺、道德涵养”为主的素质教育，影响了一大批学生。许多学生毕业后，纷纷投奔延安，参军从戎，走上革命道路，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故事隐藏在历史深处，需要进一步去挖掘。

“在寻访中我深深体会到，‘国立一中’已成为一种精神，激励着师生们在漫长人生中抵抗遇到的所有困难、挫折，这既是教育文脉的延续，又是民族精神的传承。”李永翔说。

# 关注国立一中系列报道

# 我市两女摄影家作品入选北京国际摄影周

本月7—13日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昨天，记者从市女摄影家协会获悉，我市女摄影家张书俭、陈秀峰的摄影作品，入选2020北京国际摄影周。7—13日摄影周将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届时，女性视觉下的沧州故事，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张书俭的《蓝色畅想》、陈秀峰的《吴桥杂技——晨练》。张书俭是市女摄影家协会主席，她的这幅作品拍摄于2017年吴桥国际杂技节期间，镜头对准正在表演舞蹈的女演员们，绿色的地面上，女演员们身着蓝裙，头戴蓝冠，犹如从天而降的仙子，画面灵动，

又具有东方美感。陈秀峰是市女摄影协会会员，这幅作品拍摄于吴桥杂技小院，蓝天白云下，一条长凳上放着两摞红砖，小男孩儿正手撑红砖练习倒立，晨曦下尽显力量美。两幅作品选题文化气息浓厚，画面优美，展现了新时代沧州人不同的生活侧面。

据悉，2020北京国际摄影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学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承办，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中国通信摄影协会等协办，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摄影类文化活动。



运河初雪飞鸟渡

王少华摄